

●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产权、治理结构与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低效率探源

张克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产权、治理结构与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低效率探源

张克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产权、治理结构与企业效率:国有企业低效率探源/张克难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ISBN 7-309-03197-0

I. 产… II. 张… III. 国有企业-企业管理-研究-
中国 IV. F27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290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94 千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50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的制度性成因。为此,作者试图将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论题置放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逻辑框架内加以廓清、改造和再整合,勾勒企业起源、性质、产权制度基础、内部权利安排、外部市场环境的概貌,并从动态“再生产”的角度揭示产权、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演进趋向及其与效率的关联性。进而,遵从“系统和动态演进”的方法论,综合比较中国国有企业内生的“历史逻辑”与演进的“理论逻辑”,描述国有企业在不同时期独特的产权制度基础、外部体制环境、内在性质、治理结构、行为方式及绩效结果。着重指出,不同于一切经济产权且延续至今的行政化国有产权才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最终根源。因此,欲从源头上消除国有企业低效率综合征,就必须对行政化的国有产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循着产权——市场——企业的逻辑顺序深入展开。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1 现状描述与问题的提出	1
1.2 低效率探源 I：理论回溯和制度主义的解释	6
1.3 低效率探源 II：企业、市场、产权与效率	14
1.4 提出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和本书的结构安排	21
第二章 现代企业理论的内容和古典的企业理论框架	26
2.1 分析框架与方法	27
2.2 新古典厂商论简评：“厂”论还是“商”论	30
2.3 关于企业的性质	33
2.4 企业合约及其需要加以论证的前提	40
2.5 团队生产中的剩余控制权—索取权分配： 再议产权和企业所有权	45
2.6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权利安排和治理结构	52
2.7 委托代理关系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56
第三章 传统经济模式中的国有企业	62
3.1 全民—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国有企业的 逻辑起点	63
3.2 全民所有简析	64
3.3 国家所有和经济产权的行政化	70
3.4 政府—企业：企业在传统国有经济模式中的地位	76

3.5	传统国有企业与计划价格体系	89
第四章	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治理结构、行为与绩效	96
4.1	中国有没有“企业”	96
4.2	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内部人	100
4.3	传统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	106
第五章	承包制：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制度的过渡形式	118
5.1	改革的理论逻辑、实践进程和制度样本的选取	118
5.2	对承包制改革的总体评价	124
5.3	承包制条件下的企业行为	131
5.4	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职工行为的变化	139
5.5	两权分离理论考	147
第六章	寻找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突破口	154
6.1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背景和新问题	155
6.2	内部结构改革论思路：资本变债权	166
6.3	外部环境改革思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172
6.4	产权改革论思路：新两权分离和造就法 人产权主体	177
6.5	对几种改革思路的评论：寻找突破口	181
6.6	简短的结语：国企改革突破口到底应该 选在哪里	194
第七章	造就现代国有厂商	196
7.1	深化国企改革：“功夫在诗外”	197
7.2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备选方案	210

7.3 改革构想的思想实验：外部、内部的治理结构 与效率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5

第一章 导 论

1.1 现状描述与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有组织的国有经济改革实际上先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①自1984年“包字进城”,全面经济改革启动之后至今,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被一直当成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20多年过去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行绩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进而,人们应如何据此来评价这种“企业本位”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呢?

改革以来,中国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以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工业部门为例,从1978—1998年的21年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7%,这个增长速度,不仅为同处于过渡经济之中的东欧各国的增长率所无法比拟(负增长),也远远高于各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的工业增长率。大体与此同期,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从1978年的2226亿元增长到25883亿元。仅在1991—1994年几年间,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就从14954亿元增长到31219亿元。

我们知道,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增长率和规模的迅速扩张并非

^① 由政府组织的国有经济改革试点始于1978年,而农村经济改革则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开始,人们常说,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际上不如讲,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改革之后才出现的特有现象。即使在传统体制下,国有经济也曾有过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只不过相对于“高投入”而言,表现为“低产出”而已。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看,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此,部分国外经济学家作出了相当乐观的判断。继美国匹斯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Rawski, 1988)和布兰德斯大学的谢千里教授(Jefferson, 1992)的工作之后,一批国外学者相继对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他们普遍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扭转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或负增长)而获得了明显的改善。部分进行这类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几种估计数见表 1.1)。^① 照此看来,高速增长伴随着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表 1.1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作 者	时 期	样 本	年增长率	贡献份额
谢千里等	1980—1992	总和数据	2.5%	36.2
帕金斯	1980—1992	300 家企业	2.7%	
罗斯基等	1980—1988		2.4%	
诺顿等			3—4%	
杨坚白	1979—1989		2.48%	28.5%
林青松	1980—1990	961 家企业	1.5%	31.3%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毅夫(1997)、张维迎(1996)、张军(1996)等人的著作。

然而,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则与上大相径庭。重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他们在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率时采用的是劳动生

^① 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胡永泰等人经过测算后认为,1984—1988 年之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其量为零。参见《经济研究》1994 年第 6 期。

产率、资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率等常规性的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这些指标也被人称为“经济效益”的指标。而这些指标表明,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持续下降的。例如,我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和产值利税率分别从 1978 年的 15.5%、24.2% 和 24.9% 下降到 1.0%、6.5% 和 10.0%。近十几年来,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各种效益指标反而远低于“历史最好水平”的抱怨。与之相应,是亏损企业的增加和亏损额的不断攀升。自 1996 年第一季度首次出现了建国后尚无先例的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净亏损状况后,至 1997 年,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亏损面已经上升到 43.9%,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中亏损户达到 6 599 户,全部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造成的亏损额为 1 420.9 亿元。此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于 1998 年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这些数据又表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远未成功。

一方面是“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是“效益”的下降。这非常类似于微观经济理论模型中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的结果,即在同时实现“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同时,经济利润或“准租”却呈下降之势直至趋于消失。^① 此时,若站在“消费者主权”的立场上看,随之增大的“消费者剩余”意味着更好的福利结果。而站在企业所有者的立场上看,利润的减少和“效益”的下降又是相当不利的。因此,若经济学家各执一端,仅仅把国有企业自身按时间序列排定的“效率”或“效益”数据加以比较,基于价值判断的不

① 按照教科书的讲法,完全竞争市场实现长期均衡时,会有“五线过一点”,市场价格等于长期和短期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 $P = LAC = SAC = LMC = MC$, 此时,企业范围内实现“生产效率”(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企业生产每单位产量的成本最低,但“超额利润”为零;社会范围内实现“配置效率”(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长期均衡产量在使产品成本最低的同时,又使得社会获取一增量单位产品的成本与获自该单位产品消费的边际收益相等。也就是说,趋于长期均衡时,“效益”(利润)下降,“效率”上升。

同,显然就会对国有企业的运行绩效和改革成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① 不过,如果考察的是在我国业已形成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相互竞争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国有企业的相对绩效,那么,无论采用的价值判断和计量标准有什么不同,经济学家们或许都会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相对增长速度、相对“效益”,抑或是相对“效率”,都是相当低下的。

例如,1980—1994年,中国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5.7%,比国有工业的增长率高1倍。这表明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非国有工业。再如,1982—1995年,国有工业对整个工业产值的贡献份额从2/3以上下降到不足1/4,从而使不少学者认为,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和主导波。又如,据国家体改委1994年对289家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调查,亏损企业(亦即税后资金利润小于零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为39.2%,集体企业的亏损面为27%,股份制企业的亏损面仅为2.8%。

利税率高可以是“作账”的结果。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相对经济绩效,结果将如何?据林青松(1995)的测算,1981—1990年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为1.52%,大大低于城市集体企业的7.89%,也低于乡镇企业的2.37%;刘小玄、郑京海、比格森(1995)的估算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乡镇企业,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40%—60%;Murakami(1994)的估算结果则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性效率只相当于合资企业的48%,相当于乡镇企业的56%左右。谢千里等人在

①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几年前罗斯基曾在我国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在那篇文章中,他论述了我国采用的经济效益概念和微观经济学中经济效率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说明在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之间并没有一致性的关系,从而两者完全可能呈反方向变动。参见《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目前,面对着国有企业“效率提高,效益下降”现象,与罗斯基类似的论点又重新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注意,并据此对这种似乎是悖论式的状况作出了颇有价值但也各不相同的解释。

1995 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从 1988—1992 年,国有部门的 TFP 的增长开始显著下降,增长率从 1984—1988 年的 3.68%下降到 1.58%,而集体部门的 TFP 在 1988 年以后仍继续加速。如此等等。

另一个易于观察到的现象是国有资本的严重流失。据国有资产管理部的估计,仅在 1980—1993 年间,国有资本就已累计流失了 5 000 多亿元。暂且不论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但国有资产流失的趋向可以大致概括为:国家—企业,企业—个人,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中资—外资。鉴此可以认为,与国有企业“生产”的相对低效率(或低效益)相伴生的,还有“流通”和“分配”的相对低效率(或低效益)。或者不过是前者的特殊表现形式。

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加上资产流失,可以合称为“低效率综合征”。它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多元所有制经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国有经济在众多领域的大面积“退出”,以及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的持续下降。仍以工业产值为例,1980 年各种经济成分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国有经济占 75.98%,集体经济占 23.53%,城乡个体经济占 0.02%,其他经济类型占 0.47%。到 1997 年,上述各种经济成分则分别占 26.5%、40.5%、15.9%、17.1%。从 1988—1997 年的 10 年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平均每年下降约 3 个百分点(见图 1-1 所示)。可以说,如果这种低效率综合征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国有经济规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以较大幅度下降的前景是不难预期的。

从国有企业相对低效率的角度看,证实了国有企业改革尚有待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据此,人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为什么会相对低下?造成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换言之,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当如何确定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或“核心”?这是本书自始至终力图加以解答的基本问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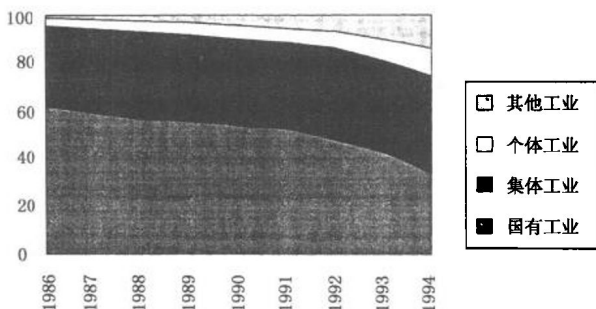


图 1-1 工业产值构成的变化

1.2 低效率探源 I：理论回溯和制度主义的解释

要解答上述问题,首先要知道影响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

无论经济学家们怎样定义经济效率的概念,也无无论在考察经济效率时采用什么样的计量指标,一般而言,经济效率总是表现为对比特定质量的要素占用量、耗用量即“投入”(Input)而言的相对“产出”(Output)量。因此,经济学家往往从“投入”的角度来考察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但是,在众多影响经济效率的“投入”因素中,到底又是哪一种因素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经济学家的看法历来众说不一。就主流经济学而言,以下四种说法可供比较。

一是资本决定论。古典经济学家十分强调投入要素中资本的作用。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时下所说的“经济效率”还是用劳动生产率来定义的。斯密在他那个著名的制针工场的例子中,论

证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分工。而进行细密的分工要有足够的人数,进而,人数的增加以及单个工人在分工条件下占用与耗用的生产资料的增加,又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预付资财”即资本的积累。因此,在他看来,资本对于效率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二是管理决定论。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中,产出量同样是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的因变量。但是,产出增加从而效率提高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的数量,更取决于各种要素的有效组合。而多种要素最佳组合是用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的切点刻画的:当各要素的边际产量之比等于各投入要素的价格之比时,也就实现了要素有效的组合。且不论这种理想状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充分的经验对照物,实现要素的有效组合显然是“管理”或“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ial Ability)这种“第四种生产要素”的职能。所以,微观经济理论也不时提醒或暗示人们,管理是影响企业效率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技术进步决定论。在很长时期里,从生产函数中看不到技术进步对效率的作用。这种状况因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R·索洛的贡献而改观。他发现(Solow, 1957),在产出增量中有一个很大的且无法用要素投入量增加来解释的“余值”部分。这个余值或曰“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的存在,被他归结为“技术进步”。^② 据他的测算,技术进步对现代美国宏观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

① 斯密指出,在制针工场中,不实现分工,一个工人一天最多生产 20 根针,实现分工则能生产 4 800 根针。实现充分分工就要追加劳动力的投入。但是人数增加,从而分工使每个工人耗用的生产资料成百倍的增加,就需要大大增加资本的积累和追加投入。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② 一种简洁的表达式为: $g_Y = \alpha g_L(1 - \alpha)g_K + q$ 。式中 g_Y 、 g_L 、 g_K 分别表示产量、劳动、资本增长率, α 是产出增长中劳动贡献系数。 q 则是对无法用劳动 L 的增长,也不能用资本 K 的增长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量的度量,即“索洛残差”。参见 O·J·布兰查德和 S·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第 2—5 页。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87.5%。实乃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文献中,所谓技术进步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同义语,泛指全部投入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并表现为给定要素投入量的产出的增加。而后,丹尼森和肯德里克等人又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更细的项目。如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相当于本来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改进等等,更为具体地反映了产出/投入比率提高的来源。

四是人力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为产出增长从而效率提高提供了新的解释。但是,随着全要素生产率越分越细,技术进步概念外延将不断扩展,这意味着能够归结为本来意义技术进步之上的“余值”部分将越来越小。或许正因如此,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T·W·舒尔茨才把将余值归因于“资源生产力”的说法讥为“给我们的无知起了一个名称,但并未消除我们的无知”。按照他的高见,“人力资本”才是决定产出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不仅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远快于非人力资本,还在于它具有其他要素所没有的“收益递增效应”。故而产出与收入的增长,以及多种经济绩效的差异,都可以归因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是教育投资)的差异。^①

上述列出的四种说法莫衷一是,但又都言之成理。若按照他们的逻辑,在同一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段上,或者在同一经济发展空间内的不同经济成分之间,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优势、管理的优势、技术进步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都将表现为相对效率的优势。但是,我们观察中国不同经济成分的效率差异时,看到的恰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1) 从资本投入看,国有企业在全社会总资本中长期占有最

① 舒尔茨的有关论述可详见《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大比重,并且一直具备着优越于非国有企业的资本供给条件。如1992年,国有经济部门对GNP的贡献已下降到31%,但国有经济投资仍占总投资的75%;至1995年,虽然国有工业的产值比例已经降到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但其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仍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60%以上。

(2) 从管理能力看,许多人也把管理水平低下看作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从而疾呼“向管理要效益”。但从总体上看,比之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国有企业中一直具有更为完善、严密和规范的管理制度,更为深厚的管理经验的积淀和综合素质更高的管理者队伍。不能笼统地讲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及非国有企业。

(3) 从科技进步看,国有经济部门至今仍拥有着非国有经济无法比拟的科技开发的实力和潜力。仅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就拥有着占全国54%的科技开发机构,45%的科技人员和近49%的科技开发经费。如前所述,这也并没有带来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优势。

(4) 从人力资本看,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也拥有突出的优势。一方面,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国有企业中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素质最高的职工;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除政府、个人之外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一,在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持续地投入巨额资金。而它们与其他非国有企业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别,却并非如舒尔茨所称的那样“完全符合相应的教育的差别”。

仅看资源赋存条件,国有企业无疑是中国经济中的精华部分,然而它迄今也是国民经济中效率相对低下的部分。上面列举的四种论点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也说明,一定还存在着某种制约经济效率高低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因素也就是“制度”(Institution)。

R·科斯(Coase)获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他在其著名的《论社会成本》一文(1962,中译本,1992)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被人们所有、使用、交易的生产要素其实并不是物,而是所有者拥有的“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即产权(Property Rights)。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效率的影响才会是中性的(即所谓科斯定理1);而一旦交易成本 >0 ,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就将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即所谓科斯定理2)。这个不同凡响的发现为现代经济学对经济效率根源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1968年,D·诺斯(North)在他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1600—186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未发生诸如轮船取代帆船这样的重大技术变革,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大幅度提高了。原因是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幅度降低了海运成本。这个简单的史实既可以说是对科斯理论的经验证实,又可以说是对索洛理论的经验证伪: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同样可以大大促进产出的增长。

后来,诺斯在他的成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译本,1988)一书中又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发明、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非增长的原因,但却是增长。”^①照此说法,索洛、舒尔茨,甚至于斯密等人所讲的各种决定增长的因素,其实都是增长本身,和产出增长是一回事!那么,决定增长的真正因素是什么?诺斯认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以及这些组织赖以形成的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在他看来,只有在特定的制度能给经济当事人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时,才会有人均收入或“绩效”的提高。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诺斯也终于在1993年摘取了诺贝尔奖的桂冠。

① 诺斯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所谓“真正的增长”,即人均收入的增加。这种增长概念与效率提高的含义是直接相通的。